

湖湘

熊建华 著

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文库

熊建华 著

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熊建华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8

ISBN 978-7-5538-0101-8

I. ①湖… II. ①熊…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湖南省—
商周时代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6899 号



湖湘文库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

作者 熊建华

责任编辑 管巧灵 王文西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网 址 <http://www.yueluhistory.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邮 编 410006

电 话 0731-88885616(邮购)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39.75

字 数 46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8-0101-8/K·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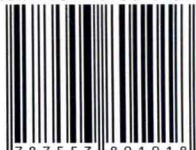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金州新区泉州北路100号 电话:0731-87878880

邮编:410600

ISBN 978-7-5538-0101-8



9 787553 801018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杜家毫	陈求发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郭开朗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许又声			
副组长	李友志	王汀明			
成 员	钟万民	姜儒振	史耀斌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周用金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 言

马承源先生指出，“吴越地区青铜器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以商周青铜器发展的序列来套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中原商周青铜器对于吴越诸国青铜器铸造工业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要从吴越青铜器大量考古资料的实际出发，做具体细致的排比研究，从各种现象中寻求合理的解释……”，“史料的运用，作为一支大的标尺，也不能不注意。如果完全离开历史记载，则整理研究工作就会造成困难”^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观点对南方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展历史，正验证了这种观点。

一

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数十年前就在他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将中国古代主要部族分为三大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其中，苗蛮集团的中心就在今湖北、湖南^②，大致就在我们所说的以“江套”^③为中心四周扩散的空间

① 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研究》，《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③ 熊建华《试论以湘江流域为中心的蜩形动物饰青铜器》，《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里。在这个空间里，时间上大致可以与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史前考古学文化。湘江流域，尤其是湘江洞庭湖地区商代青铜尊彝等大型容酒器出土最多的地区，就处在这些文化的地理空间里。

屈家岭文化的年代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石家河文化晚期已与夏王朝立国时间重合，在石家河文化的遗存中发现过铜的冶炼遗迹。一般来说，中原地区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而在紧靠湖北汉水的丹水流域、所谓“江套”北部边缘的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文化层上叠压二里头文化一、三期遗存，出土遗物有铜制工具和玉戈等；著名的盘龙城遗址，也有上下两层堆积，上层的考古学文化，就是商代二里头文化与殷墟一期文化，是长江流域相当商代早期青铜器最大最集中的发现地，下层则叠压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遗存中包含了与铜器冶炼有关的陶缸与坍塌，甚至有二里头时期的青铜礼器。这个时代的湖南，青铜器的铸造还处在启蒙阶段。

盘龙城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最早的青铜器冶铸中心，对湖南青铜铸造业的诞生有直接推动。该遗址文化层既然包含了从二里头时期到殷墟一期的考古学文化内容，也就意味着这些考古学文化对应的历史年代——夏代到商代早期再到商王盘庚迁殷时期，这里都有人在铸造青铜器。大家都注意到了这里的青铜器从器形到纹饰与河南郑州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高度相似，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该遗址文化层中的陶器，第一期本地原居民文化占上风，第二、三期商文化元素分量不断加大，到第四期，商文化因素占主导，而到了约当盘庚迁殷早期的时候，盘龙城就衰落了，陶器则又回归明显的土著文化色彩。刘彬徽先生认为，盘龙城文明

“是在本地相当于二里头阶段即夏王朝时期文明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中原文明而最终形成的”^①。此说与考古学文化显示的现象非常契合，值得重视。

作为地理空间上的近邻，盘龙城的发展，为湖南青铜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顺着“江套”底端向南，长江南岸的湖南很早就与盘龙城一带建立了紧密关系。地处南岸“江套”顶端的岳阳云溪铜鼓山遗址边的墓葬中出土了与二里岗青铜器没有什么区别的、时代略晚的青铜鼎、觚等^②，遗址文化层里则出土了镞、削、泡等小件青铜器^③，铜鼓山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与盘龙城相同，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就是盘龙城文化的铜鼓山类型。从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中，我们已知岳阳的铜鼓山遗址是一处以受盘龙城影响的、商文化因素为主体的文化，但在遗址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与这种主流风格迥异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商代晚期的岳阳费家河^④遗址找到了延续的线索，其中体型高大、侈口带管状底的大口缸（外形像“将军盔”）、硬陶等就很有代表性。考古学文化的这些现象说明，盘龙城、铜鼓山遗址的居民与其南面洞庭湖东岸居民是有联系的，受盘龙城影响，本地开始铸造青铜器是可能的。事实上，位于岳阳汨罗新墙河进洞庭湖入口处的温家山墓地就出土了石范，地处洧水入

① 刘彬徽《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② 胥卫华《岳阳市市郊铜鼓山遗址新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2002》，岳麓书社，2004年。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求索》增刊，1989年。

④ 湖南省博物馆等《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探掘》，《考古》1985年第1期。

湘口的高砂脊遗址甚至发现过陶范，湘江上游商周遗址与石门市遗址等也有石范出土，铸造青铜器的范如此普遍发现，说明商时期的湖南是有能力在本地铸造青铜器的。

二

尽管如此，从考古发现的湖南古代文明发展进程看，在距今10000年至距今5000年的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比并不落后，但大约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的时候，长江与黄河的文明竞赛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青铜冶铸技术，黄河流域突然走到了长江流域的前面，中原青铜文明崛起并凭此确立了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崇高地位。从中国古代青铜器冶铸历史考察，长江流域青铜冶铸业的发生发展与中原青铜冶铸业有天然联系，因而一直没有也不能完全摆脱中原在技术上对长江流域青铜冶铸业的强大影响，加上三代政治中心在中原，不时有新的因素影响长江流域青铜器的铸造，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感到长江流域青铜器不仅技术，而且主题似乎一律源自中原。可以说，包括湖南境内商周青铜器在内的长江流域青铜器，就大的体系而言，确实与中原青铜器孕育于同一母体，也就是说他们属于同一个大的体系。

然而，即使是双胞胎兄弟，当他们分散到不同文化环境成家立业的时候，尽管先天的影响无处不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兄弟之间尤其是兄弟的后辈之间，会显出巨大的观念上的、文化上的差异。湖南商周青铜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中原青铜器的同异，正是同一母体的兄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而出现的。

根据湖南古代青铜器的实际情况，笔者曾主张将湖南古代青

铜器分五大时段进行认识^①。

（一）商代早中期（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青铜器开始进入湖南，开始有小规模的青铜器铸造，代表性器物是小型鱼具与手工工具，如镞、锥、刀等。

（二）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世纪），湖南青铜器的使用与铸造有了全新发展，该期器物既深受中原青铜铸造技术影响又逐渐发展并形成自身特色，代表性作品有青铜大铙、高圈足大口尊、动物立体造型器物群等。这一阶段的器物，多元文化影响特征十分明显。

（三）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约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5世纪），多元文化影响发展过程中，湖南地区开始形成新的地域文化，新的地域文化主导下的湖南青铜器，青铜乐钟的铸造与使用引领一时时尚，盘口鼎、撇足鼎风行，器物装饰突出南方环境特征，水生动物纹及与中原完全不同、显示地方风俗的纹饰开始成为主流。

（四）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晚期（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湖南青铜器打上了明显的楚文化烙印，但楚人对湖南的影响呈渐进南向发展，有的地区西周晚期业已受到影响，而即使到了战国时期，大湘南、大湘西地区其他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仍不时出现。楚文化影响下的湖南青铜器纹饰有繁缛如纺织品般的艺术效果。

（五）秦汉（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秦尤其是汉以后的湖南青铜器，主要成了铸制日常用器或塑造艺术品的材料，

^①熊建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精粹·青铜器》，上海书店，2003年。

青铜器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虽有许多匠心独运之作，但这时期的青铜艺术品已很少有地方特色了。

三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相当中原历史序列中的商代、西周、东周（春秋阶段）时期的湖南，青铜器与青铜文化考古以及代表性器物，是认识古代湖南历史的主要资料，也是湖南古代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研究课题中最有意义、最难以得出公认结论的章节之一。本书重点探讨的就是商、西周、春秋中期以前出土于湖南的青铜器，即笔者所主张的湖南古代青铜器发展历史中的第一至第三阶段的青铜器以及与青铜器可以连接的、发生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人的故事。

研究湖南商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我们的第一个视点就是湖南的母亲河——湘江。湘江通过洞庭湖而通江达海，通过长江、汉江，而与中原大地连接在一起。湘江众多的支流中，洸水因与青铜器发现地点的关系而引人关注。洸水，是湘江转向北流向洞庭湖之前的一条普通支流，湖南商周青铜文化与青铜器最重要的发现，就在这条支流上游的宁乡炭河里、下游的湘江入口处——望城县高砂脊及以之为中心向岳阳、益阳、衡阳方向扩散的山间、溪畔（图1）。大量出土文物证明，以湖南宁乡炭河里、望城高砂脊为中心的湘江流域是我国南方商周青铜器埋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发现的青铜器证明，商代中晚期以后，湘江流域出土青铜器的铸造水平作为整个长江流域或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一度跟上了中原的发展步伐并逐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但在学术界以及关心古代历史的民众中，这些发现与他们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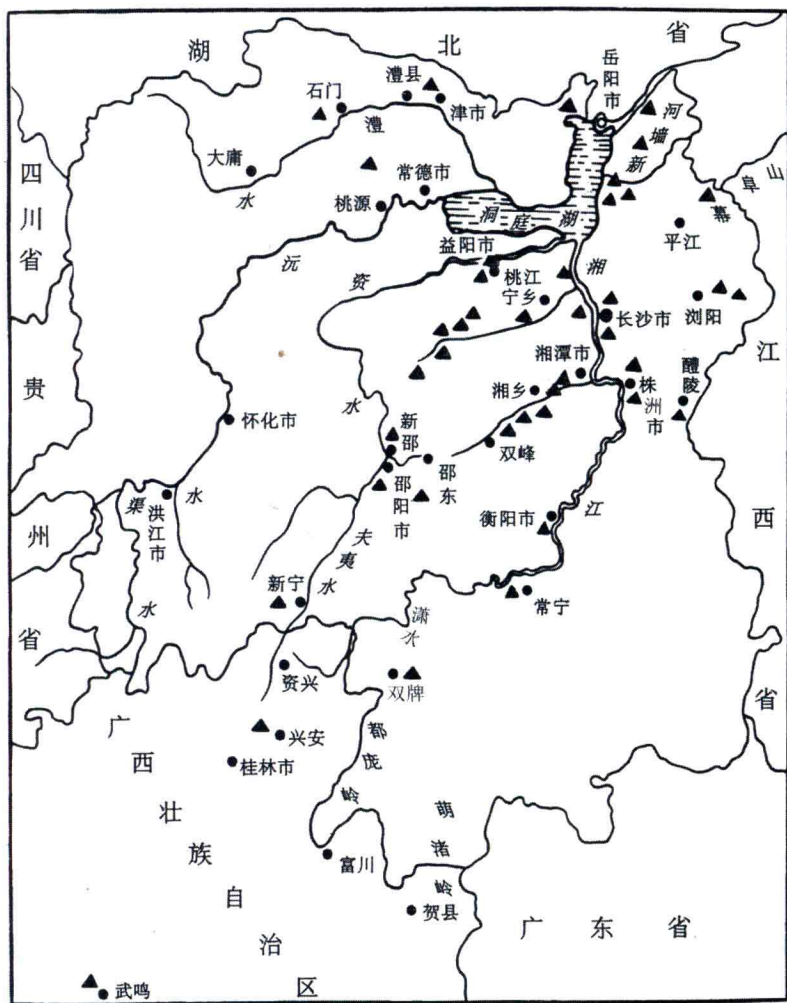


图1 湖南商至西周青铜器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史书上读到的历史反差太大，谁是这些青铜器的主人？谁铸造了这些青铜器？看似简单的问题，因为是发现在史书上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湖南而让大家纠结不已。

现代版图的湖南与商周时期的湖南要在空间概念上进行区别，湘江洞庭湖区青铜器发展水平，其实与江汉平原、鄱阳赣江流域的关系十分紧密，可能并不是《史记》、《汉书》中所指的蛮荒之地，但我们在聚焦今天湖南版图内湘江洞庭湖地区的青铜器与青铜文化时，还必须放眼澧水、沅水、资水的发现。在这些流域所串起的区域，有的地方发现了湖南最早的青铜器，有的地方发现了可与湖南少数民族历史甚至与整个大西南民族发展历史对应的青铜器，有的器物时代可能稍晚，与主导湖南古代历史的湘江洞庭湖地区青铜器与青铜文化发展序列也有所不同，但从一些文化发展的迹象中我们发现，恰恰是这些地区的青铜器，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传承了春秋以前湖南青铜器及其文化特质，这些地区直到唐宋时期都与中原主流文化有很大差异。或许这些区域才是史书上的蛮荒之地，而湘江洞庭湖地区很早就融入中原主流文化之中，只是中原主流文化的一种地方变种而已。

四

对中国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性质的认识，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代表中国式政治制度——礼乐制度的用器——青铜礼乐器的选择。在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礼制体系中，核心的部分是“鼎簋制”，而且是以数量的多少来分等级的，尽管这种制度商与周有别，甚至一种观点认为鼎簋制度西周时期才确立，但从殷墟妇好墓的发现看，商代鼎，尤其是方鼎，也是有特殊政治意义的。生

活在湘江流域的商周居民，其实也接受了这种理念，但明显淡化了这种理念。在这里，更推崇的是器物本身的神秘性与精妙性，因此，这里的青铜礼器，动物造型的器物多且精美，即使是传统的中原器形，在这里也被铸造得更神秘而充满想象力，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有四羊方尊、象尊、虎卣、人面方鼎、猪尊、马簋等。一批明显显示地方独特使用方式的、特别有个性的器物也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这就是以大铙、铙为代表的青铜乐器系统。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湘江流域洞庭湖地区的族群最推崇、使用最普遍的青铜器就是青铜大铙，这种器物，高大厚重，使用时间长，西周中晚期后演变成了甬钟，甬钟影响了被视为中华文化正统的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音乐文化。其次是铜铙，江西新淦^①出土的铙可以早到殷墟早中期，铙在湘江流域出土很多。甬钟和铙钟，是周代以后到汉代流行的编钟的核心乐器。这种独特的乐器文化，一直是长江以南青铜器铸造的重要类别，春秋以后，长江流域仍铸造一些独特的青铜乐器，如句鑃、铎于、扁钟等，汉代以后直到清代则流行铜鼓。文化的传承、对乐器的选择模式与赋予的精神内涵，完全有别于中原地区。

通过对这些实物及其所处文化背景的分析，我们或可为确认湖南青铜器的主人与铸造者找到一条通道。

五

湖南青铜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直接影响我们对上述课题的研究。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青铜器研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

^①现在的出版物中已简化为“新干”，笔者认为这种简化不如“新淦”表达好，本书全部用“新淦”。

的、得到公认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但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不少学者在进行一些个案研究时，谈到了南方青铜器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自有体系说。张长寿先生在研究吴越兵器时指出，剑这种兵器并不是中原地区的产物，商周时期的短剑也不是商周文化传统，剑更不是短剑的自然延伸，“剑这种兵器有可能是在南方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安徽）屯溪的剑与著名的夫差剑、勾践剑相比，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因此重新研究剑的发生、发展的序列也许和南方青铜器的研究是同样重要的”^①。他在论述湖南青铜器来源时，也推测“或是在黄陂盘龙城这类南方二里岗期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遗存”^②。美国学者贝格立通过一些具体器物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一些一般认为是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与殷墟青铜器作比较只能引起混淆；应转而与二里岗时期青铜器作比较研究，并在南方青铜器彼此之间作比较”^③。运用这种观点，或可解释长江流域一些青铜器既有商代早期的特点又有商代晚期的特点这么一种现象。如江西新淦出土的双耳伏虎大方鼎（标本008），造型显然与郑州发现的二里岗期大方鼎相似，同时有明显自身特点，如鼎耳上的伏虎。故对其年代判断分歧很大，或认为就是二里岗期器，或认为是二里岗与殷墟之间的过渡性器物，如果同意贝氏上述论断，则南方

①张长寿《论屯溪出土的青铜器》，《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②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③贝格立《南方青铜器纹饰与新干大洋洲墓的时代》，《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青铜器发展到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时方有自己的特点，南方青铜器上既有中原早期特点又有自身比较晚的特点的形制特征，正是南方青铜器继二里岗（商代早期）青铜器之后，与中原平行发展的结果。但这一理论令人疑惑的是，南方建立自我传承系统的时间点如何确定？那些留在南方青铜器上的明显中原特色的、时代又无早晚关系的文化符号如何解释？

其二，滞后说。这是马承源先生最早公开提出的^①。这种观点坚守中华文明的中原中心传统的一元论观点，即所有器物形均是先在中原铸造成功的，中原才是各种器物形制标准的确立者，中原确立青铜器形制的标尺后，再向周围传播，传播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时间差。根据这一理论，上海学者认为湖南一带的兽面纹大铙的年代不会早于春秋，鄱阳赣江流域的新淦大墓、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墓或祭祀坑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的年代也被推到西周甚至更晚。李学勤先生也有专文讨论过这一观点。他根据自己对中国青铜文化七个文化圈的划分，认为中原与东方在商至西周时期面貌比较一致，其他地区都可视为“非中原”，指出中原以外的青铜器，“每每不能用中原青铜器序列作为标尺”^②。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多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一些错误不断获得纠正。有一种“文化滞后”现象是好判断的，那就是发达地区（中原）经济社会发展了，偏远地区（非中原）仍保留原有模式发展，就像吴越地区春秋青铜器还有西周甚至商代青铜器特点一样，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滞后时间的长短到底如何确定？如商代晚期

①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第4期。

② 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